

广州史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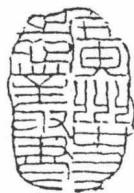
民国广州城市 与社会研究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民国广州城市 与社会研究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454 - 0355 - 8

I. 民… II. 广 III. 城市史—广州市—民国—文集

IV. K296. 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55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韶关市工业东路 3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1
字 数	312 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4 - 0355 - 8
定 价	25.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 学术研讨会综述

（代序）

2008年10月31日上午，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人文历史基地、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广州地方史学会在广州南沙科技资讯园联合举办“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梁世平，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林生、副主任胡巧利，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晓明、书记徐元平以及广州地方史学会会长赵春晨、副会长冷东，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陈泽泓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等高校以及广东省社科院、广州市社科院、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东民间工艺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专家学者77人参加了研讨，会议收到论文47篇。

会上，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梁世平就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学会如何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推动学会工作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两个学会近年来联合开展学术活动的模式和学术研讨取得的成果，对两个学会的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林生、地方史学会会长赵春晨分别致辞，肯定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鼓励学者深入发掘民国时期的地方史志资料，广泛研究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为当前广州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以及建设全省首善之区提供历史借鉴。在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华南师大谢放教授、广东省社科院赵立人研究员等10位专家学者作了发言。31日下午，研讨会分两个小组进行研讨。与会人员敞开思想，阐述自己的主要观点，并对相关专题进行探讨。

本次研究会有四个特点：一是参加研讨会学者范围十分广泛。既有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省社会主义学院等高校的学者，也有来自省社科院、市社科院、市地方志办公室、广东民间工艺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市图书馆等文博单位以及地方志工作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会学者几乎遍及广州地区的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加入到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队伍。年青学者提交的论文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较新，为此研讨会注入了新活力。年青学者加入到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说明此项研究后继有人，发展前景广阔。三是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许多学者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城市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四是研讨会论题广泛，涉及政治、宗教、教育、地方志、工业、外贸、城市建设与管理以及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等多个领域。可视为对民国时



期广州城市史的全面研究。

本次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宏观层次对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史进行了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变迁史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是赵春晨、陈享冬的《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刍议》。文章提出，民国时期的广州遗留下了数量巨大且比较完整的档案史料和充盈的文献、旧报刊等，还有大量声像与实物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依据。目前应将收集、整理民国时期广州的文献资料摆在研究工作的首位，将城市近代化进程作为研究的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眼界，开展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以改变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在国内相对落后的状态。李吉奎的《陈炯明与广州设市》提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出任广东省省长期间，为适应形势要求，施行了一系列促进广州发展的举措：一是广州设市，维护《广州市暂行条例》的严肃性；二是支持制定相关市政管理条令；三是支持市政建设事业；四是支持各行业成立工会，协调劳资关系。从1921年1月至1922年4月，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广州市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也带动了两广其他城市设市和发展。沈成飞的《试论沦陷时期广州市保甲制度的推行》，对沦陷时期广州市保甲制度的推行进行了研究，充分揭露了日伪掠夺的强制性和利己的随意性，突显了其殖民统治的特征。刘新峰的《试论民国初期广州市政体制创新》对民国初期广州市政体制创新的背景、内涵及意义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

二、多侧面研究了民国时期广州经贸发展的历程

多侧面研究民国时期的经贸发展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特点。谢放的《民国时期广州民族工业的历史命运——以煤油工业为中心》，以煤油工业为中心，分析了广州煤油工业的发展和迅速走向衰落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广州工业的历史命运，亦有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倪根金、周米亚、赵艳萍的《华南工业近代化的珍贵记录》，以民国广州第一蔗糖营造场市头炼制处相片为例证，对1929—1936年白糖制造业的情况进行解读与分析。张晓辉的《对外贸易与民国前期广州的建设发展》提出，对外贸易与民国前期广州建设发展的关系是多元的，呈现出结果的复杂性。外贸是广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粤海关长期外贸出超虽不能改变全省外贸的半殖民地性，但对广州的建设和发展却非常有利。华洋资本在广州市场激烈角逐，势力互有消长，舶来品固然带有倾销性质，但对民族资本生产技术改良和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亦有促进作用。外贸发展促进了广州地区民族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繁盛，对城市的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龚伯洪的《民国广州实业界的创新》一文提出，民国时期，“振兴中华”、“振兴实业”给广州实业界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济棠主粤，广州的民营实业远胜从前。创新叠出是当时广州实业界的特点。当时诞生了先进经营模式的内地第一家现代大型百货公司，建起了南中国之冠的旅业大厦，扬起了“食在广州”的美誉，等等。





科的建设已经提到了方志学界的面前。胡文中的《形式服从内容的佳作——试析1935年广州首部综合年鉴》对广州市首部综合年鉴进行了介绍，认为1935年出版的广州市首部综合年鉴，以其翔实、全面的资料，服从内容需要的灵活的记述形式，使其成为一部存世价值极高的年鉴，或可以说是一部民国初期广州小志。

六、对教育、宗教及社会文化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

此次研讨会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探讨得比较多。何薇的《陈济棠主粤时期的广东教育》论述了陈济棠通过扩大教育投资、实行义务初等教育、整顿巩固普通中学、大力兴办职业学校、发展高等教育、普及社会成人教育、个人投资办学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广东教育的发展。这方面还有，王晓莺的《民国时期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的办学特色及其主要影响》，王发志、徐奇堂的《民国时期广州陈氏书院内创办学校》，郭海清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教育的发展》等文章。

此外，郭金凤、王丽英的《民国时期广州道教宫观》，杨冠丰的《民国时期有关广州“五羊衔谷”神话》，邵骏、徐奇堂的《民国时期广州饮食文化繁盛的表现和原因》，丁蕾的《民国时期南越王墓的考古追寻》，叶从容的《民国时期粤方言写作现象》，丁邦友《20世纪以来广州乡村宗祠的发展历程》，罗美玲的《民国初期广州女性同性恋问题》，郭小聪的《“团一大”召开时广州的社会背景》，汪叔子的《竹枝词所记黄埔军校初创时广州社会背景》，黎俊忻的《省港大罢工在社会生活上的一些侧面》，陈享冬的《民国时期广州的火灾》，陈智慧的《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的毒害与禁毒》等文章对民国时期广州宗教及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

《广州史志丛书》出版说明

当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只有这样，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积累地情资料、开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整理旧志、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广州史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广州史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有关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
- 二、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研究成果；
- 三、史志理论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由《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并由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广州史志丛书》将陆续出版，恳请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内容、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任 杨资元

副主任 王林生 胡巧利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杰 李扬 冷东 杨长明

张晓辉 张影华 陈文敏 钟永宁

倪俊明 倪根金 曾新

目 录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代序）	(1)
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刍议	赵春晨 陈享冬 (1)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博弈——从合作、对抗到合作	王林生 (9)
陈炯明与广州设市	李吉奎 (17)
陈景华与民国初年广州警察制度的改革	赵立人 (31)
蒋介石与粤桂战争	李启伦 (40)
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沈成飞 (45)
对外贸易与广州的建设发展（1912—1936）	张晓辉 (56)
民国时期广州民族工业的历史命运——以土制煤油工业为中心的分析	谢 放 (72)
民国广州实业界的创新	龚伯洪 (80)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模范住宅区计划	李淑蘋 张洪娟 (86)
民国前期广州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生活	吴宏岐 王 炜 (96)
民国时期广州电信业述略	曾繁花 (107)
浅论民国时期广州百货业的发展	冯静雯 李芳清 (115)
民国时期广州的商品展览会	冷 东 刘燕霞 (124)
民国时期广州地方志编修评析	胡巧利 (128)
记述翔实、形式灵活的广州市首部综合年鉴	胡文中 (134)
新见民国广州市第一蔗糖营造场市头炼制处照片考释	倪根金 周米亚 赵艳萍 (140)
民国时期广州道书考论	王丽英 (153)
消闲笔下革命潮——竹枝词所记黄埔军校初创时广州社会背景	汪叔子 (161)
试论民国时期岭南书画特点及其影响	刘进贤 (172)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教育的发展	郭海清 (175)



民国时期广州岭南大学的办学特色	王晓莺 (179)
民国时期广州陈氏书院内创办学校概述	王发志 (184)
“五四”前后至抗战前的广州近现代体育运动述略	肖承罡 (187)
广东近代体育先驱者何剑吴	关文明 (195)
民国广州城市公共救济事业的经营实态——以广州贫民教养院为例	方 靖 (199)
民国时期广州的火灾	陈享冬 (205)
后记	(217)

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刍议

广州大学历史学教授 赵春晨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陈享冬

【提 要】民国时期是广州城市发展十分重要的阶段，深入开展民国广州城市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民国时期的广州遗留下了数量巨大且比较完整的档案史料和充盈的文献、旧报刊等，还有大量音像与实物的史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依据。目前应将收集、整理民国时期广州的文献资料摆在研究工作的首位，将城市近代化进程作为研究的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眼界，开展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以改变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在国内相对落后的状态。

【关键词】民国时期 广州 城市史

广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著名城市。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推动，广州的城市近代化也较国内大多数城市起步为早，发展也较快。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近代化得到全面展开，尤其是1921年广州在全国率先建立新市政体制以后，城市近代化发展更为迅速，从而使其成为近代中国极具影响力和个性化特点的城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东学界迄今对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历史的关注不够，研究较少，这对客观和全面地认识民国时期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历史、借鉴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都是不利的。因此，本文拟对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资料条件、研究方法等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与建议，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广州城市发展历史中，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1912—1949年），却是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首先，就城市行政体制而言，在1918年，广州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市政建设机构——市政公所。其后又在1921年2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城市政府——广州市政厅，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从此，广州市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地位，建立了专门从事城市管理的行政机关，划分了市区，摆脱了南海、番禺两县共管的状况，确立了新的市政体制，这对于



广州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次，就城市经济而言，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具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虽然在清末广州已经成立了一些新式企业，但近代工业企业在众多门类里广泛建立、形成规模，则是在民国时期。据统计，到1936年，广州已有工业企业11523家，其中近代工业企业3218家，工业总产值3.43亿元，从业人员达7.84万人，其中工人6.74万人^①。由此可见，广州工业此时已形成相当规模，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广州具有传统优势的商业（尤其是外贸）、金融业、农业等，在民国时期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发展势头，并逐步向近代化转型；近代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壮大。到抗战以前，广州已经从一个传统封建性的区域行政中心与旧式商业城市，初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工商型的口岸城市。再次，就市政建设而言，民国时期的广州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历史上广州城市建设基本属于自然发展的模式，有规划地进行整体设计和建设是在民国时期。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即着手实施近代广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拆除旧城墙和13个城门，利用城基修筑长10公里、宽25~33米的新式马路。到1921年年初广州市政厅成立前，已筑成惠爱路、一德路、丰宁路、永汉北路、万福路、百子路、德宣路、文德路、永汉南路、越华路等花砂马路，另有7.5英里（1英里=1609.344米）马路正在修建之中^②。与新式马路出现相同步，广州市内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轿子、马匹，逐渐换成了人力车和汽车。此外，在城市的邮电通信、照明、自来水、卫生、消防、公园等设施的建设方面，广州也都逐步进行，获有成效。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后，对城市建设工作负有专责，因此也更加重视。1928年，广州市政府设立城市设计委员会。1929年，市政府公布《广州市政实施计划书》和《广州市之建设计划》。1930年，由市政建设专家、工务局局长程天固亲自编著《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对广州市区地志、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规划。1932年，市政府又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在不断完善和修订城市规划的同时，广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包括修筑马路、疏通沟渠、整治江岸、改善交通、兴建公用设施、建筑商店和住宅、扩充邮电业务、增加电力和自来水供应，等等。以道路为例，1932年广州已建成的新式马路总长为80公里，1936年增加到138.8公里^③。在城市建筑方面，完成了多项标志性的市政建筑工程，包括中山纪念堂、石牌中山大学校舍、中山图书馆、海珠铁桥、市府合署办公大楼、爱群大厦、中华戏剧院等。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近代气息的大都市。

民国时期的广州在全国城市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典型性。首先，作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在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广州是孙中山三次建立革命政府的地方，即1917年9月的中华民国军政府、1921年4月的中华民国政府和1923年2月的

①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② 倪俊明：《广州城市道路近代化的起步》，《广东史志》，2002年第1期。

③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的深入研究与了解，人们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广州的历史，也就无法真正认识近代中国的城市。更何况由于历史传统上的差异和所处环境的不同，民国时期广州的发展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又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个性。它既不像香港、上海那样属于新崛起的口岸城市，也不同于北京、南京等是古都之所在。故而对于它的研究，可以更加彰显中国各个区域与城市之间在历史长河里同中有异、异中又趋同的多彩画面，加深人们对于我们民族与国情的认识。

就现实意义而言，民国时期广州史的研究对于今天广州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不仅因为民国时期是广州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而且由于民国时期与当代直接衔接，有着不容忽视的传承性。无论是就城市发展所要完成的现代化历史任务而言，还是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至于一些具体的建设规划与项目，当代广州与民国时期都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或者承继的关系。因此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的状况、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都是今天广州城市发展所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二、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依据

开展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史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有极为丰富的资料依据。首先是在民国时期，广州留下了数量巨大且比较完整的档案史料。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档案史料是最原始的资料，可信程度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广州相关的民国档案，主要收藏在广州市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其中广州市档案馆收藏最多。广州市档案馆所收藏的广州民国档案，共有149个全宗，83941卷（册）。所藏档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广州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反映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北伐、广州租界情况以及广州与香港、澳门关系的材料；反映广州建市（市政公所、市政厅、市政府）历程的材料；反映民国时期党、政、军、警、宪、特和各种社团组织状况及其活动情况的材料；反映民国时期著名人物如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孙科等活动情况的材料；反映汪精卫伪政权统治广州情况的材料；反映日军在广东省和广州市侵略史实和进行细菌战等暴行的材料；反映外国驻穗机构和教会活动的材料等^①。广东省档案馆也收藏了许多民国广州档案，包括民国档案（即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日伪档案、海关档案。其中，民国档案有93个全宗，50997卷，包括民国时期广东省的各种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外国驻穗机构的档案；日伪档案有2个全宗，45卷，主要是日本广州银业交易所和海南岛日本海军特务部的档案，以及汪伪广东省政府机关形成档案（分散在相关全宗里）；海关档案包括1861—1949年粤海关等10个全宗的档案共13260卷，内容涉及海关业务以及广东政局、重大事件和社情民意的情报资料。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民国广州档案，分散在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档案中，为数不少。从2005年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广州市档案馆就合作开发“民

^① 广州市档案馆编：《广州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国广州档案”史料签订合作协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工作人员 10 多人，从馆藏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机构档案 180 多万卷档案中查找出有关广州地区的档案近 7000 卷，经逐一审定，最后选定 122 个全宗，3133 卷（册），其中包括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全宗的全部档案（475 卷），共 30 万幅，时间跨度为 1905—1949 年，内容涉及北洋政府时期、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汪伪国民政府时期广州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金融、工商、教育、交通、邮电等多个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这些档案按原件比例扫描存储，刻录成 405 张光盘，容量达到 280 千兆，同时编制了专门的档案目录，于 2006 年年底一并交给广州市档案馆保存。这些选编、制作的广州地区档案史料，填补了广州市档案馆馆藏的空白，对于研究民国广州城市史无疑将发挥积极作用。在广州下辖各区、市档案馆及部分高校档案馆中，也有一些民国广州档案，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档案大都以 1945—1949 年为主，其他时段的档案并不完整，尤其是民国前期档案数量较少。此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国外如美国、日本、英国等也收藏了大量与民国广州有关的档案。近年来，这些档案史料被陆续开放，如台湾所藏蒋介石档案、俄罗斯所藏共产国际档案、美国所藏民国人物档案等，值得研究者注意。

除档案外，民国时期广州还留下了丰盈的旧报刊及文献史料。报刊是近代兴起的新兴载体，所刊内容包容甚广，利用价值甚高，尤其在民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报刊史料的重要性几无可代替。民国时期广州报刊业较为发达，如在 1921 年，广州就有《新报》、《新国华报》、《市场日报》、《泰报》、《国是报》、《中外商报》、《快报》、《广州晨报》、《国华报》、《七十二行商报》、《现象报》等 39 家报社^①。其中如《越华报》、《现象报》、《七十二行商报》、《公评报》、《广州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报纸都是发行时间长、发行数量大的老牌报纸，《越华报》、《现象报》的发行量更达两万多份。这些报纸广泛记录了当时广州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研究民国广州城市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报纸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存下来，其中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收藏最多。幸运的是，1923 年 8 月至 1929 年 12 月间的《广州民国日报》被影印出版（共计 42 册），这为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城市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同时一些全国性的大报如《申报》、《大公报》等也时有一些民国广州的报道。此外，当时香港、澳门等地出版的一些报纸也有许多广州的报道，其中《香港华字日报》尤为著名。民国时期广州也出版了大量杂志，其中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收藏较多。另外，当时广州各机构、社团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报告、调查统计资料、征信录等文献史料。据不完全统计，有关民国时期广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图书就有 3656 种^②。这些文献主要收藏在中山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中，其中以孙中山文献馆收藏较多。此外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等

^① 《广州市市政概要》（民国十年），广州市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编辑发行，1922 年，第 67—72 页。

^② 李仲伟、林子雄、倪俊明编著：《广州文献书目提要》凡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也收藏了部分民国广州文献资料。同时，许多欧美人士以其独特的视角，描述了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发展。其中《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等西方人士在中国所办的英文报纸不时对民国时期的广州进行报道，而《远东杂志》（*The Far Eastern Review*）等西方杂志则经常对广州的市政建设进行评论。香港的一些英文报刊也经常报道有关广州的消息，甚至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也曾经报道过民国时期的广州。此外，在广州生活或游历过的外国人士留下了不少的著作，记录了他们对于民国广州的认识。其中如 Edward Bing-Shuey Lee 所著的《现代广州》（*Modern Canton*）更对民国时期广州的市政建设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论^①。这些外国人士的记述，往往超脱了种种政治因素，而以西方的一些大城市作为标准来分析判断广州的城市发展，虽然有些认识因为缺乏对广州当时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而带有片面性，但其独特的视角却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民国的广州城市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此外，民国时期人们留下的许多家谱、回忆录、文集甚至日记、账本等私人史料也反映了当时广州城市发展的状况，尤其是以口述史料和回忆录为主的各级政协文史机构所编辑的文史资料，如《广东文史资料》、《广州文史资料》等也收录了大量与民国广州城市发展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虽有不少疏漏不实之处，但研究者经过仔细慎重的对勘后，还是能够充分利用的。而且现在一些年老的广州人亲身经历过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建设，如果能够把他们的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并进行整理，那么这些丰富的口碑资料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民国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

除了上述文字史料以外，民国广州还遗存了大量的音像、实物、旧建筑等，这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广州市区，还保存有 200 处有代表性的近代建筑，其中主要以民国时期为主，而且其他的实物也很多。^② 这些实物史料使我们能够摆脱文字资料的束缚，直接感受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发展的状况，从而有可能更好地贴近历史。同时，广州还留下了大量民国时期的音像资料。如广州市档案馆就收藏了约 7000 张民国时期的照片档案，大致可以分为国民党党务、政务、经济、重大历史事件、景地等 12 类，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保存下来的一些民国时期的电影、纪录片等资料，其中也有不少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广州城市生活的一些场景。相比文字史料而言，这一类史料显得更为生动，人们的感受也更为直接。这也是回到历史现场的一种重要途径，是研究者所不能忽略的。

三、加强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毋庸讳言，尽管开展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有丰富的研究资料可供研究者利用，但迄今为止民国广州城市史的研究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与国内开展近代城市史研究较早的上海、重庆、武汉、天津等地相比，民国广州城市史研究还存

^① Edward Bing-Shuey Lee: *Modern Canton*, The Mercury Press, 1936.

^② 马秀之、张复合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6—41 页。